妇女节,向“燃灯校长”致敬

□ 仇进才

不久前,她还曾走着上台接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荣誉;8天后,她便只能坐着轮椅,被推上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从站到坐的距离,是1804个可能辍学的孩子走入了梦想的学府,是一个老人罹患20多种疾病后的默默无言,也是一个党员对信仰的毕生坚守与实践。

张桂梅,一个刻在时代的立柱上的名字,如崖畔桂,胜雪中梅,平静地在轮椅上端坐,便挺直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那双手,如果不贴满膏药,就会因为关节的疼痛而不能屈伸。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每一个名词都让人噤若寒蝉。几年的时间,无数个日夜,没人知道她的疼痛与艰难,就连张桂梅自己也不清楚。因为她并不在意。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她充分发挥了党的优良传统,心中只牵挂着孩子们的未来,存放作为师者、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母亲的博爱的情怀。在党员的觉悟与信仰的支撑下,她冷眼睥睨所有不堪言的折磨,把教育振兴当作一场战役,一场再坎坷也必将胜利的战役。

对她而言,看着女孩们被宿命绑架回辍学务农、过早嫁人的老路上,是比病痛更戳心、更猛烈的痛苦。孩子们不能等,虽然这些问题党委政府终会逐步解决,但是孩子们只有一次选择人生的机会,错过了便是永远的失去。在山区,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成了母亲,生下的孩子继续重复着上一代的命运,这样的恶性循环只会在山区的发展上留下大片的疮痍,让积年的陈疾更加难以医治——也正如张桂梅自己身上因为不断拖延,而恶化得愈发严重的病情一样。那飘扬在她心头的五星红旗让她无法无动于衷,即使忍受着冷眼、误解和歧视,也要四处奔走,化缘,甚至乞讨一般地去筹集资金,每一个脚印都被暮色的眼泪灌满,最终才让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如愿诞生。因为那颗赤子之心不能不跳动,所以她甘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像一根铁棍,毅然投入齿轮与齿轮的咬合中,去阻止遭遇的复刻,去打破宿命的轮回,让无数女孩的命运被重新书写。

她说,拯救了一代人后,那一代人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长此以往,山区才能逐渐回归良性发展的轨迹。有人问她这么拼命值得吗?值,她含着笑。牺牲一个人的幸福,可以创造成千上万人的幸福,为什么不值呢?

她是把一颗真心完全地给了山区里的姑娘们。为了达成这个梦想,张桂梅把各种奖金和看病的钱都用于办学。在记者采访时,她仔细地纠正了记者的用词,“这不是贫困山区的女孩子,而是大山里的女孩子。贫困对女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隐私。”这样的细致,充满了尊重与善意。

“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这是张桂梅教育理念的顶梁柱。“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蔑视卑微的懦夫”,这是张桂梅对党员精神豪情万丈的诠释,也是对新时代女性力量的有力的注解。在她的体内,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红色基因熠熠生辉。

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写道:“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载誉归来,她轻声一叹:“大家值了!”她并不居功,而是把它归功于和她站在统一战线共同拼搏的人们。张桂梅这三个字,已然是一个集体名词,是所有在平凡中创造伟大的教育工作者的美誉。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燃灯校长是对张桂梅的赞赏,而这盏灯的光芒,也是对每一个党员的指引,在无数人的接力中传递下去,直到每一根黑暗中的烛火都能被重新点亮。

有人说,共产党人最擅长的就是创造奇迹,而张桂梅,无疑便是对这一说法最铿锵有力的论证。

白岩松曾和她约定,“十年,二十年,我们一直看着”,张桂梅笑了笑,“我会不会失约啊”。在网上,我看到无数网友的共同祈愿:“张校长,请一定要保重身体!”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待到山花烂漫时,一定要看你在丛中笑……

心香一瓣

你好,我的『李焕英』

□ 姜宝凤

我的母亲叫孙先英,生于1949年,真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她饱尝艰辛,沐浴甘露,亲身经历了火红年代凯歌行进的豪迈,感受了文革荒诞至暗的十年浩劫,也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风风雨雨走过了七十二年。

母亲出生后,是家中九个子女中靠清汤寡水和命大存活下来的四个娃之一。母亲没有童年,更没念过书,仅仅在村里扫文盲时端着煤油灯上过几天的“识字班”。母亲年轻时在生产队是个标准的“铁姑娘”,干起农活儿来如风卷残云,修田、推车、锄秧、收割,干啥都没落过后,每天挣得工分比男劳力还多两三个。媒人将母亲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正在县上师范。言语木讷的父亲只给爷爷奶奶回了一封信,说现在都是新社会了,无须家人包办。言外之意,父亲是拒绝这门亲事的。可爷爷奶奶中意的是母亲的泼辣能干和敦厚率直的人品,所以就应允了媒人。

父亲毕业后,分配到了外乡一个偏远的村庄当教师。父亲和母亲的婚礼简单而又符合那个年代惯常的程序,父亲借了一辆自行车就把我母亲驮进了家门。

后来,母亲接连生了我们兄弟三个。我懂事的时候,常记得母亲用独轮车推着我去地里干活,那时我家承包了十亩责任田,母亲硬是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把半亩薄地填上了一层七八厘米厚的土。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时都相继跟父亲出去念书了,自然家里沉重的负担就扛在母亲一个人那瘦弱的肩上。在我幼小的心里母亲身上总沾满了黄泥巴和一身的疲惫。母亲常说:“我不识个字,可不能屈了孩子呀……”母亲的铮铮铁骨和勤劳,支撑着我们全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兄弟三人发奋读书,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都考上了大学。一家供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在世代与泥土打交道的小村庄曾掀起了一阵波澜。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我家的生活也逐渐殷实起来。记得那年,母亲饲养了二十多头大肥猪出栏后,她喜滋滋地抱回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也是我们全村的第一台电视机。自从我家买回这台电视后,到我家看电视的人那叫一个多,屋内挤不下,只好把电视移到院子里,嫌院内人多挤得慌,有人干脆攀到院墙顶上。而我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大街上的群儿之首,就连以前欺负过我的几个大孩子也主动向我套近乎献殷勤,只为我能同意他们到我家看电视。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有我们兄弟三个小时候穿的鞋子差不多都是母亲自己做的。童年的我,最爱听的也是母亲纳鞋底的声音。每天晚上,在土炕的油灯下,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母亲那“嗤—嗤—嗤”的纳鞋声。母亲一会儿把针尖从发髻上划一下,一会儿紧紧刚上好的鞋底,许多次我都情不自禁地抬起头看见油灯下母亲那专注的神情,是那样的和蔼与慈祥。

参加工作后,我们三人回家的次数日渐减少。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母亲独守着乡下的老宅,我和两个哥哥数次劝她跟我们进城居住,但母亲执意不肯,她说根扎深了,哪也不愿意去了。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她总是早早坐在村口的磨盘上等我们,那佝偻的身影显得异常瘦弱单薄。母亲一边说有一两个月没回来了,又一边说工作要紧别老想着家里。母亲一次比一次老了许多,一头略显蓬乱的灰发,褐色的脸上刻着道道饱经风霜的皱纹,浑身贴满了膏药。每次看见母亲,我心中总有一种生活的沉重感,这种感觉至今让我在工作上不敢奢想浮漂。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坚持送出很远,我总是一次次回头向她摆手,鼻子酸酸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那天走出电影院,我想着母亲,想着一个女人从羊角辫的少女变成一头白发的耄耋老人,突然明白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每一个儿女的成长,都有一个“李焕英”在身后守候呵护,千千万万个“李焕英”,用真与善,用她们的坚韧与柔软,谱写了一曲曲深沉而博大的奉献之歌,那就是无私的母爱。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并诚挚问一声:你好!

人间真情

春 信

□ 李 真

我始终不能问你
正如我不能
问一朵花
关于春天到来的消息

我只能将目光眺向远方
像打量远方
山的润朗,水的绵长
在光阴的一笔一划里
隔着山与水
捕捉着你的讯息

我始终不能问你
只得将一朵花蕊
别在衣襟
凭手指去解读你风中唇语

而当你若有所悟向我走来
你是以桃红,或杏白
来染色
这抹山水长轴的春意

而我欢悦的心
连同枝头的风
突然变得很静
每一个枝头的花 都翘然以待
为你悄然起身站立

长河浪花

曹风

把春天『推回家』

心飞扬 摄

母亲的眼神

□ 李振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家庭电话仍是奢侈品。母亲住在菏泽市牡丹区的中和路天水巷90号,现在的金河湾小区,与曹州书画院毗邻,紧靠护城河。那时,正常供电问题刚刚解决,已经不用经常换保险丝了。在家兄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去邮电局办理了电话预交押金手续,2980元,之后就是等候安装。当时的家距市中心较远,主网不通,这一等就是多半年。

家庭聚会时,妻子经常抱怨,饭等人。由于没有手机联系,常常隔着窗户眺望。我当时居住的西环生活小区,建设早,较规范,各项设施比较齐全。由于在办公室工作,处理事情综合叠加,下班时间常常身不由己。一个人,顶酷暑,冒风雨,骑车,从东城到西城。

西环小区,主网已通,接线盒就在我们楼下。母亲毅然让我家先装机。我当时还认为仅为了告诉妻子是否回家,安一部电话,太不划算。由于是母亲安排,所以也就没有推辞。

一年多后,单位处理公用电话,每部500元。后勤主任问我要不要,我要了一部,给母亲装上。从胡同口的电线杆拉线,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可以通话后,当天晚上,是母亲往我家打的第一个电话,那是我们母子俩用现代通讯工具的第一次沟通,让我终生难忘。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声音清晰如在眼前,我们娘俩既高兴,又激动。这之后的岁月里,用电话与母亲联系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不能回家,打个电话,是问候母亲的最好方式。

那时,病中的母亲身体急剧消瘦,眼睛几近失明,走路气喘吁吁。一百米的路,要走好长时间,还要歇一歇。我望着生命行将枯竭的老母亲,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一次,我用单位座机与母亲通电话,铃声响后,父亲接的。那时,母亲已是糖尿病后期,伴随心梗、脑梗、小脑萎缩、偏瘫等多种疾病,已卧床了。电话机就在床头边的桌子上。她急切地说:“让我接,让我接,是老二的!”后来,我经常与她通话,让她高兴高兴。

周末的一天,在母亲那里吃过午饭,我们要回我家。母亲拄着拐杖执意要送我们到大门口。儿子最知母亲的心意,我随口说:“送呗”,她很高兴。她一直送到门口,坐在门口的小石狮子旁,目送我们一家三口。

到了胡同口,我回头看,她仍在那儿,呆呆地望着,是那样的不舍,又那样的无助,不停地挥手!我与她回应,让她回家吧!正是这次目送,我发现了她的孤独,她的寂寞,她对生命的爱恋,对亲情的渴望。因此,没有其他事情,我节假日就去看望母亲。有时上下班途中,顺道绕个弯,坐一坐。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时光如梭,永不再来。对母亲的思念,如同美丽的浪花,常常在我的记忆深处翻腾,又像是一颗颗珍珠,镶嵌在了我的生命里,美好而珍贵。

现在,我已做了爷爷,有个小孙女,妻子到昆明去照看。视频聊天时,望着她天真、可爱的样子,走路的姿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延续与美好。母亲不在了,孙女在一天天长大。这就是天伦之乐吧!我知足,庆幸。天天在享受亲情的温暖!

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一 个 土 盆

□ 陈 奇

土盆,顾名思义,即是用普通泥土像烧制砖瓦一样烧制的盆子。如今已很少见,但凡偶尔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总会亲切地看个够,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慈祥的父亲因一个土盆发脾气的情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被分配到黄河岸边从事农村工作。1963年,一家人被迫离开县城,随父亲来到高庄公社农村。没地方住,被民政上安排到高庄集村南四五里路的荒郊野外,公社为灾民所建的一处三间土坯房里暂时安身。我们兄弟4人,四弟3岁,三弟7岁,我9岁,大哥12岁。全家要劳力没劳力,要土地没土地,全靠父亲一个月24元的工资生活。日常使用的洗脸盆,就是一个比饭碗大不多少的小土盆。土盆极不坚固,弟弟洗脸时不小心又碰裂了一个纹,直往外渗水,洗脸时要将盆子靠近锅台半侧立,已盛不下一瓢水。每天早晨起床后,一家人轮流用其洗脸。

夏日的一天傍晚,我们兄弟4人随父亲在家西面的大河河堤上纳凉,突然发现距我们约100多米远的河道里,有一个人拉着一地排车土盆过河。因当时极度贫困,人们修不起桥,只是在河底的中间部位放了两节水泥管,在上面用泥土简单垫垫,路人过河要先下坡,后上坡。而这拉盆人过河下坡时还算容易,上坡时就难了。只见,他攒足劲拉盆爬坡至半中间时就再也拉不上去了。如若后退,将会有车翻盆烂人伤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我们看得真切,正不知所措,父亲手一挥说:“好危险,咱快帮那人推车去!”于是,我们父子几人一起向拉盆人飞跑过去。父亲从车尾部使劲往上推,我们兄弟四人分别在车两侧向前转动车轱辘。那拉盆人信心大增,大家一起喊着号子:“使劲!使劲!”原本已经开始下滑、后退的车子又继续向上爬坡了。上坡后又一直被送过河堤,行至平坦的道路上。拉车人感激万分,几次欲跪地叩头致谢,父亲一次次把他拉住,亲切地说:“甭这样,不用谢,没事了,你慢慢走吧。”可三弟又逞能,继续鼓足劲儿,帮那人推车前行了一段路。

我和四弟及哥哥、父亲又回到河堤原来的地方聊天。过了一小会儿,只见三弟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土盆,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父亲大惊:“小三,你咋给人家要个盆子?”

“不是我要的,是那人感激不过,给了我一个小盆。”

“不行,你赶快给人家送回去!”

平时很慈祥的父亲,没想到竟为了一个小土盆发起脾气来。三弟委屈地想哭,继续辩驳说:“又不是我要的,是他给我的。再说,咱家那个洗脸盆都漏水了,早该买个新的了。可你却一直说还能凑合着用,舍不得买。”

父亲见三弟委屈地带着哭腔直抹泪,刚才帮那人推车累得满头汗珠子还在往下滚,又心疼地说:“这盆咱收下也行,得把钱给人家。”

父亲从腰包里掏出两毛钱交给我,说:“二,你去追那人送钱,难道帮人家推一把车,就收下一个盆?甭管值钱不值钱,都不能这样。”

看到父亲那严肃的面孔,我心里虽也不太情愿,可父命不可违,还是接了钱去追那拉盆人。我气喘吁吁地边追边喊那人:“请等一等……等一等,钱!”

天已快黑了,那拉盆人正急匆匆赶路。忽听后边有人呼喊叫停,且满口“钱”字,惊疑地停下车子,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是给你送钱的,你刚才给弟弟一个盆,俺爹让我给你送两毛钱。”

“啊,给我钱?我不要钱。要不是您爷几个,我今天就倒大霉了。再说,我给您的小盆是贩盆时人家赠给我的。”

我硬把两毛钱塞给他,像完成一桩神圣使命转身就往回跑。那人更是感动极了,边追我边说:“这个小土盆拿到市场上卖,也就是几分钱,最多不过一毛钱。你给我两毛,绝对不行,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边跑边对那人说:“你就收下吧,不要追我了。”

那人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又拉着重车走路,此时,他哪有我一个小孩子跑得快。我猛跑了一阵子,再回头看他时,已被我甩得远远的。他不得不停止追赶,站在路的中央,远远地望着我向前奔跑。

我已看不清他的面容。我想,他会一直望着我的背影,直到我消失在夜幕下的茫茫荒野里。

最最难忘